

跋涉集 系列之四

鸿鹄集

爱新觉罗弘毅题词

穆鸿利 著

中国国际出版社

跋涉集

系列之四

鴻鵠集

愛新覺羅氏張廷斌

(北方民族文化史论)

穆鴻利 著

中国国际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凡

封面设计：沈 河

封面题簃：爱新觉罗·启骧

跋涉集·鸿鹄集 穆鸿利 著

出 版：中国国际出版社

地 址：香港九龙望角弥敦道 582 号

发 行：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 编：100011

印 刷：香港广益速印厂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14

插 页：8

字 数：35 万字

印 数：1 - 500 册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88 - 97753 - 4 - 4/K·23

定 价：（平）全套定价 152.00 元 本册定价 36 元

（精）全套定价 188.00 元 本册定价 46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鸿鹄集（北方民族史论）

甲、北方地域文化编

- 一、中华北方古老文明之摇篮
——红山文化探论* (1)
- 二、论北方民族对中华文化发展的贡献（提纲） (9)
- 三、试论古人心目中对民族问题的可贵见解 (12)
- 四、《中华思想宝库》论民族 (18)
- 五、大唐文化与东亚文化圈的形成 (25)
- 六、丰彩多姿的北方民族古文字及其研究整理断想 (42)
- 七、东北民族与疆域沿革及其研究概说 (56)
- 八、松辽文化探论 (73)
- 九、行走于神与人之间的使者
——谈东北各族较普遍的信仰萨满教 (97)
- 十、《简明东北通史》序 (120)
- 十一、《辽阳古今人物》序 (128)

乙、北方各族的历史与文化编

- 一、回鹘的历史与文化 (131)
- 二、女真族的历史与文化 (149)
- 三、略论北方民族在元代文化发展中的贡献 (184)
- 四、蒙古族文化 (203)

五、回族文化·····	(226)
六、畏兀儿族文化·····	(237)
七、元代契丹女真遗民文化·····	(250)
八、哈萨克族文化·····	(262)
九、柯尔克孜族文化·····	(293)
十、乌孜别克族文化·····	(315)
十一、塔吉克族文化·····	(327)
十二、塔塔尔族文化·····	(337)
十三、俄罗斯族文化·····	(343)
十四、裕固族文化·····	(348)
十五、东乡族文化·····	(363)
十六、保安族文化·····	(377)
十七、土族文化·····	(388)
十八、撒拉族文化·····	(402)
附：穆鸿利论著目录·····	(421)
后记·····	(431)

一、中华北方古老文明之摇篮

——红山文化探论^{*}

被誉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的红山文化，是我国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最发达又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一种文化，是我国乃至东北亚仅见的绵延不绝、高峰迭起的北方古老文化系统，从玉龙故乡查海村落遗址到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均以其卓异的风采、多层面的文化内涵令世人和学界叹为观止。

一、红山文化遗址的分布范畴

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红山文化的认识在不断深化。1935年最先在赤峰市郊红山后发掘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是以彩陶和细石器共存为特点的一支文化，当时命名为赤峰第一期文化^①。1954年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年代约为3500年前。它是以红地黑彩陶器与压印之字纹陶器共存、大型打制和磨制的石农具与用作切割刮削的细石器工具共存为主要特征^②。过去，考古界大多数认为，红山文化是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种原始农业文化。直到本世纪70年代前，关于红山文化的发掘工作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长期以来仅发现了石器和陶器。

从7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又不断在西喇木伦河、老哈河、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大凌河流域的若干地点，先后发现一些红山文化的建筑址和墓葬，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玉器。1971年，有关人员从内蒙古翁牛特三星他拉村征集到一件墨绿色玉龙，高26厘米，光洁圆润，是一整块玉料的圆雕。龙头吻部前伸，长鬣高扬，身弯如钩，造型美观并富有生气。背部穿一孔，系绳悬挂，头尾垂直。但是，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曾误将其年代断在商周时期。1973年，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胡头村农民在村西临河断崖上，发现一座被河水冲蚀的石棺墓，发掘结果，墓上暴露出一个石砌的圆圈和依石围弧度排列有序的彩陶筒形器群，墓内共搜集到18件玉器，经研究，这批造型别致而生动的动物玉器，为仰韶文化所没有，因而上述玉制龙的价值也便被重新加以认识。作为中华民族古老象征的“龙”被第一次发现，意义十分重大，这些意外的发现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更大的兴趣。于是红山文化便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联系起来，受到学界的特别重视。1979年5月，一处红山先民祭祀祖先活动的遗址，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发现。遗址座落在山梁的正中，面对着大凌河开阔的河川与马架山。红山先民们能选择这样的地势营建庙堂，还是颇费一番思索的。从遗址现场看：遗址建筑物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和总体布局，其中心建筑与两翼建筑有主、次之分，此外，还用加工过的长条石砌成南北走向的石墙。其中心建筑南部的圆形祭坛，直径2.5米，以薄石板砌出整齐的边缘，内铺一层小鹅卵石。在圆坛附近出土了陶塑人像个体残块共20多件，其中有两件无头孕妇裸体小像，残体分别高5厘米和5.8厘米，腹部隆起，臀部肥大，左臂弯曲，左手贴于上腹，阴部有三角形记号，是典型的孕妇形象。对此，专家们解释不一：有人认为，这些原本无头的女陶像是供祭祀用的；有人认为，它可能是当时人们所崇拜的“生育神”或“农神”。另外，还有两件大约是真人1/2大的无头裸体妇女坐像。这类陶质小型妇女裸体塑像，国外旧石器晚期和青铜器初期遗址曾多次发现，被称为“早期的维纳斯”，但是在我国尚属首次发

现。此后，1983—1985年，辽宁考古工作者在距喀左东山嘴祭坛遗址50公里的建平、凌源间牛河梁发现了红山文化女神庙、积石冢和小型城堡遗址，经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距今已5000多年，从出土的文物精品看，它不愧为原始社会末期的一个伟大的文化宝库，这样，中华文明的北方源头便显露其端倪。有的学者，甚至将它与商族起源问题联系起来进行了考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牛河梁遗址发现了一尊基本完整的女神头像，其大小同真人相近，从其体质特征看，是典型的蒙古人种，跟现代华北人的脸形极其相似。女神的眼珠是用一种晶莹碧绿的圆玉珠镶嵌而成，看上去双目炯炯有神，神采飞扬。尤其从其它出土的塑像残块，那些由于年龄差异而发育不同的乳房和那圆润的肩膀以及那些肉质感很强的修长手指来看，牛河梁遗址应该是有许多女神像的大殿堂。有人曾认为这些女神是“母系氏族社会的象征”。我国考古界著名学者苏秉琦教授，曾认为应从“类似古人传说的‘郊’、‘燎’、‘禘’等祭祀活动”方面去深入考察，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判断。

更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辽宁阜新地区文物普查中，在位于阜新市东部30公里处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发现一处原始村落遗址，面积达三万平方米，经过辽宁省考古工作者多次勘察和三次发掘，共出土了玉器、龙纹陶片、“之”字纹陶器和打制、磨制石器数千余件珍稀文物，现已发掘出房址23座。这个查海村落遗址，经过同位素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距今为7600年，这是我国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一处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从出土的有关器物，专家认定它是中国农业的发源地，堪称为“中华第一村”。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考察了查海遗址及其出土文物，认定“查海遗址是红山文化的源头之一，与红山文化的高峰——牛河梁原始文明有来龙去脉的关系”。

查海遗址内涵极为丰富，且原始自然风貌保存完好，没有其它历史时期遗存的干扰。“查海人”过的是定居生活，居住的房

址平面呈方形圆角半穴式，房址排列密集有序，以较大房址为中心，组成了一个氏族村落。查海遗址出土的玉器有精美的“玉块”和“玉匕”等宝贵玉器。这些玉器经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鉴定，全部是透闪石、阳起石的软玉（即真玉），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真玉器。它说明，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查海人”已经将玉视为神器之物，并能对其进行专业化加工。查海陶器以挟砂粗陶为主，分红褐、灰褐、黑色三种。有筒形罐、斜腹罐、碗、钵、樽等。器具外壁饰有压印“之”字纹、几何纹、斜线纹和压点纹等纹饰近 40 种。丰富的“之”字纹是查海文化内涵的典型代表，它既可以回答“之”字纹的起源和演变，又是人类迈出原始社会、跨入文明之门、氏族发展繁荣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素称龙的传人，很久以来，龙一直是中国人崇拜的图腾。然而，查海遗址出土的龙纹陶片又把这种图腾崇拜上推了几千年，经专家认定，“查海龙纹陶片”是“查海人”部落图腾的写照，是华夏最早的龙的图形。

总之，半个世纪以来，红山文化遗址不断被发现，其大体分布在辽河以西，西辽河和西喇木伦河以南，燕山南麓长城以北，张家口以东的广大地区，其中心是老哈河、西喇木伦河、大小凌河流域。随着人们对红山文化认识的不断深化出新，对揭示红山文化的面貌和内涵也有重大的突破，因而被学界誉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二、红山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从文化整合的角度看，红山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既包括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工具、生活器皿和精美玉器，又包括人们精神生活的信仰和礼俗、雕塑艺术和审美情趣。

红山文化的人们所使用的石器工具有磨制、打制和压制的三

种类型，其中磨制的石器最多，体现新石器时代特点，有双孔石刀、磨盘、磨棒、石镑和最有特点的类似鞋底形状的大型石耜。打制石器有矛、肩锄、敲砸器。压制石器有三角形石镞、尖状器、锥、圆头刮削器、红长石片等。

生活器皿所使用的陶器中有泥质红陶制成的小口双耳罐，直筒形罐、钵、碗、盆、豆等，烧制的火候较高，且多数的陶器上用黑彩装饰上彩纹。主要是涡纹、菱形纹、竖行和斜行的平行条纹。也有夹砂褐色陶器，比如；深腹罐、斜口罐、大口钵等。这种粗陶制成的器物上，也有压印“之”字纹和“之”字篦点纹等装饰。

查海龙纹陶片和牛河梁玉雕猪龙的发现，证实了远古时代关于龙的种种神话传说不是没有根据的，龙已成为查海——红山人的图腾。东山嘴祭坛南圆北方，正符合古代文献记载中郊社祭天求嗣的礼制。另从东山嘴、牛河梁遗址的整体布局也很值得注意。坛、庙、冢在大约 50 平方公里范围内“三合一”的规划，有人认为有点像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和十三陵，积石冢群都在山顶或小山包上，中心是大墓，周围是很多小墓，有的墓中很少或没有随葬品，有的则随葬大型精美玉器。从中可以看出氏族成员的等级分化已相当严格，具备了“礼”的雏形。这些足以说明“在这里活动的原始先民，已脱离了对自然崇拜及图腾崇拜的低级阶段，进入到高一级阶段的文明社会了。这样大规模的建筑，应属一个超越于部落之上的联盟组织”^③。可见，牛河梁女神庙、大积石冢、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说明早在 5000 年前我国的东北辽西、内蒙古东部确已存在过一个具有礼制雏形和初具国家雏型的古老文明社会。

红山文化出土的一些造型生动而别致的动物群玉雕，其中有龙、虎、鸟、龟、蝉、狗、蚕、鱼等，反映其文化和工艺水平很高，甚至为中原仰韶文化所没有。有些则与商代玉器的主要题材相同，而与南方良渚文化的玉器群，如玉璧、玉琮、玉璜、玉块

等，显然是两个系统。当然，也要指出，良渚文化的玉器群，同样也在商周得到继承和发展，如玉璧、玉琮等便是商周祭天地的礼器。

此外，陶塑女神头像以及许多陶塑人像的残体、无头妇女坐像、孕妇裸体像等，其祭祀性内容和艺术价值均为专业研究者所瞩目，对中华文明起源史和原始宗教思想史的研究，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上述对红山文化的初步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从红山文化的时间来看，距今 5000 年的文明，大体相当于传说的“三皇五帝”时期，尤其是“炎黄之世”。其所处的社会阶段已经是氏族社会晚期。从出土的墓葬来看，积石冢群中心是大墓，周围分布很多陪葬的小墓，在墓中有的则随葬有大型精美玉器，有的几乎完全没有或仅有少量的随葬品，明显地看出氏族成员的等级分化十分严格，已具有“礼”的雏形。大墓不仅筑于冢的中心部位，而且上面有积石封土，形成高耸的山头，好像“山陵”一般，这不但象征着墓主人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和权力，而且意味着基于氏族公社且又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日臻成熟，显然带有国家的雏形性质。

其次，从宗教信仰来看，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从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向诸神崇拜甚至祖先崇拜演进。女神庙有主室和侧室，有体魄硕大的主神和众星捧月的诸神。从红山文化先民们精心塑造的女神头像中，可以窥测出当时的人们对神灵的顶礼膜拜之情景。众多的神环绕着主神，表明那时的人们不但脱离了原始宗教中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阶段，也超越了对祖先亡灵崇拜的祖先崇拜的低级阶段，而进入了祖先偶像崇拜的高一级阶段。

第三，从红山文化发掘出的古建筑以及玉龙等器物，使我们看到了它对中国文化形式的直接影响，或者至少可以说明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同一性。比如，“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神圣象征，

历史来见诸于文献史籍和传说，红山文化遗址首次发现了“玉雕猪龙”，证实了远古时代关于龙的种种神话。从祭坛看红山文化的建筑讲究对称布局，祭坛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和方形祭坛。这些都与后来的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不谋而合。当然，红山文化对中华文化的直接影响，尚属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不过上述这种“趋同”现象决非偶合，其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密切联系是不言自明的。

三、红山文化研究的意义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红山文化的发现和被真正认识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首先，在于它使中华 5000 年文明得到了具体地证实。以前，我国古代有史可考的历史，一般最多上溯到夏、商、周以后的 4000 年文明史。而关于夏朝以前的历史，在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中，都只是根据传说，故很多人竟认为是虚构而不足征信。红山文化的发现，则有力地证明，早在 5000 年前，我国东北辽西与内蒙古东部一带，确曾存在一个初具国家雏型的古老文明社会，具体叫什么朝代待考，这就把我国古文明社会的历史向前提了一千多年，从而完全与世界文明古国古埃及、印度、巴比伦的历史并驾齐驱，无愧为世界文明古国了。

其次，说明红山文化区是中华北方古老文明的摇篮，纠正了过去学术界流行的“中原古文化中心说”。过去学界一向强调文化发生是由一点扩散到四方，认为中国文明只有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古文化中心说，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的旁支侧系的观点在相当时间里一直占着统治地位。而红山文化作为中华古老文化区之一，说明中华民族的古文明，绝不是单一的中原文化，而是

不同地区出现相同的文化现象，是由包括北方红山文化、南方长江文化和中原黄河文化等在内的多种文化互相融合、撞击而不断演进和发展起来的，进一步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的正确性。长城外的内蒙古赤峰地区和辽西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表明这一地区的古代先民已过着定居和半定居，兼有畜牧渔猎的经济生活，在东北平原和大兴安岭及燕山山脉接触地带，曾在我国历史上孕育了许多后来入主中原的民族，这些北方民族曾在历史演出过一场场威武雄壮的活剧，被载入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史册上。

总结和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在方法论上也很有启迪。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属于文化发生学（由一点向四方扩散）的还是“趋同”（即不同地区出现相同的文化现象）的？以往我们仅仅满足于前人的记述，用传统的思维方式研究古代史，因而得出中华民族的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古文化”中心论的结论。这种结论统治学术界达几十年之久。红山文化的发现和被认识，不仅以毋庸置疑的事实冲垮了这些陈词旧说，而且也启迪人们对中国文化史研究中的一系列传统观点进行重新思考，进而展开更加深入的、全新的探索。

注：

①参见滨田耕作、水野清一：《赤峰红山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1938年。

②参见尹达：《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

③参见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的重大课题》，载《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2期，《新华文摘》1997年7期转摘）

二、论北方民族对中华文化发展的贡献（提纲）

在广阔的中国北部边疆大地上，自古就生活和繁衍着众多的游牧、渔猎以及农牧结合的民族，他们虽族属不同，语言、文化和风俗也各有一定的差别，但他们与生活在祖国大家庭的各民族一样，不仅创造过丰富多采的物质财富，而且也创造过灿烂而绚丽的精神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各自做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

一、参与和促成了中华古老文明的创造和发展

北方各族的先民早在史前时期就创造过辉煌的文化，东北辽宁西部考古发现了距今 5000 年前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遗址，标志着中化文明曙光已呈现在辽阔北疆地平线上；西北甘肃秦安大地湾史前遗址，其中最早的文化遗址比中原仰韶文化还早 1000 多年，说明北方古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丰富和充实了中华文化的民族内容

中国北方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和半农半牧文化是中华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中，北方古文化占居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丰富和充实了中华文化的内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北方民族文化对中原文化直接发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历史佐证。与中原秦汉实现大一统局面的同一历史时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区域也出现了在匈奴族统治下的大一统局面。只有这南北两个统一或两个文化圈之间的碰撞与汇合、交流与渗透才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的内在结构。无论从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科学技术、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可以找到许多例证。

三、突出和显示了北方民族文化的本色和特征

在制度文化方面。北方民族社会组织简易，草原游牧民族实行军事联盟性质的氏族社会制度，体现了军事组织与生产组织相结合的社会组织结构。

在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也有自己的特点，诸如生活俭易、民风淳朴；胡服骑射，骁勇善战；贵壮健、贱老弱，少礼文，轻为奸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多保持着原始的巫史文化，信仰萨满教，表现为自然崇拜与祖先宗拜；北方民族的婚俗，集中地反映其生命观念、生殖观念、家庭观念和社会关系；北方民族的葬俗集中地表现他们的生与死观念，无论是土葬、火葬、天葬、风葬、二次葬、殉葬等埋葬仪式，都是一种活人与死人的生命互渗的灵魂转换观念的实际反映，这些葬仪中充满着神秘的巫术行为。

四、北方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和流动性特点

从文化类型方面说，北方区域文化包含有草原文化、森林文化、渔猎文化和海洋文化，以及部分的农耕文化，而以草原文化为基本形态。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开放性和流动性。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使这个民族充满生气和活力，不拘一格、豪迈刚直、慷慨大度、主动进取、善于学习和吸收异质文化。不过也正因为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使他们难以形成浓厚的文化传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没有产生出自己的思想哲人和文化巨人。当然，从匈奴族开始，北方民族中也相继出现一些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等。因而当它一旦与中原接触，便很容易同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同化力的农业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

三、试论古人心目中对民族问题的可贵见解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历经数千年的沧桑之变，原有的一些民族，有的凝聚、融合，有的分化、消失，不断地演化为一些新的民族共同体。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各族在频繁的交往中，时而兵戎相见，时而民族和解与合作，历经无数次艰难和曲折，矛盾和斗争，谱写了各族纷繁复杂而多姿的历史画卷。在这中间，历来众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包括历代一些有作为的君主和名臣贤相、哲人学者，均能从各自的政治眼光和所代表的阶级和政治势力出发，对民族观、民族交往、民族政策和民族融合等，提出一些可贵的看法，本文仅从几个侧面加以论列，欢迎方家指正。



在民族观上，主要是围绕着华夷正闰之辨问题，究竟是“华夷一家”，还是“贵华夏，贱夷狄”？先秦时期著名的典籍《春秋》曾明确地标榜“内诸夏而外夷狄”，力主华夷内外有别；所谓“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与中国（中原）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西汉的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一书中，又将“夷分大小”，说什么“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